

当代山东书学研究丛书 顾亚龙 主编

书同文研究

张传旭 著

山东齐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同文研究 / 张传旭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9

(当代山东书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74-2468-1

I. ①书… II. ①张… III. ①汉字—书法史—研究—中
国—现代—秦代 IV. ①J29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3736号

责任编辑 尹奎友 张雅婷

装帧设计 王一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泰安市博达彩色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7.125印张 18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总 序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云：“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书法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从甲骨文算起，中国书法已经走过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书法的表现面目不断更新，篆、隶、楷、草、行各种字体竞相辉映，各种书体及其代表作品灿烂夺目，中国书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从汉代开始，对书法发展进行阶段性总结的理论文章和著作便不断出现，如蔡邕《笔论》、赵壹《非草书》、孙过庭《书谱》等。这些书学理论在对前代书法进行总结的同时，也为书法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因此，书学理论成为中国书法三千年发展历程中永不衰竭的推动力。

当代书法的繁荣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书法终于激活沉潜的美学因子，张开理想的翅膀，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快车道。在国展大旗的感召下，全国书法创作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参展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日渐丰富。刘勰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书道亦然，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引发了书法艺术风格和创作形式的变化，中国书法正以崭新

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一过程中，书学研究的发展速度却相对滞后，全国从事书学研究的人员相对还比较少，书学研究的立项和评奖机制也不完善，较高层次的书学研究成果还不多，书学研究的整体氛围还不能和我们这个时代书法的发展程度相匹配。这些问题的出现已经严重制约了当代书法的发展，对书法学在当代从绝学走向显学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面提升书学的研究层次和研究水平将是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这有赖于书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和不懈追求。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历来重视书学研究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多次组织高层次书学理论研讨会，对山东的书法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广泛研究。自2011年以来，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经过充分调研，多方筹措资金，申报课题立项，组织开展23卷本《山东书法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与此同时，山东省书法家协会还多次组织全省书学讨论会，为广大书学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和交流的平台，进行表彰和奖励，全面推动全省书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努力，山东书学研究的业绩逐年上升，在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中山东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此后的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第二届全国隶书论坛、第二届中国书坛·金陵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山东获奖和入选的数量都稳居全国前列，引起书坛广泛关注。为继续推动山东书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入挖掘山东丰富的书法文化资源，全面提升山东书学研究层次，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决定启动“当代山东书学研究丛书”出版资助活动，为全省书学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其中一条就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要讲清楚就要搞研究，这有赖于全体书学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书法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能够进一步发挥书法文化在当代文化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广大书学研究人员能够始终坚守阵地，扎实开展工作，深入研究问题，广泛进行交流，深入研究和探讨书法的发展脉络及其当代表现形式，努力推出一系列书学研究成果，为山东书法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山东文化的繁荣奉献力量。

是为序。

顾亚龙

2015年8月31日

目 录

绪论 / 1

上编 从秦、楚文字比较的角度看“书同文”的必要性 / 7

第一章 鸟虫书与楚铜器铭文 / 11

第二章 蝌蚪文与简帛文字 / 45

第三章 古文籀文与楚文字的关系 / 61

第四章 异形字与特有字 / 86

中编 从秦汉与楚文字比较的角度看“书同文”的效果 / 97

第一章 正体：小篆的同一 / 102

第二章 俗体：古隶的统一 / 113

第三章 古体：《史籀》大篆 / 123

第四章 特种书体的流传 / 136

下编 从周与秦文字演变的角度看“书同文”的基础 / 149

第一章 东周各国文字与商周文字的继承关系 / 151

第二章 东周各国遵循共同的文字形体演变规律 / 179

结论 “书同文”成功的原因 / 213

绪 论

西周时期王权统一，文化的权利主要掌握在王公贵族手中，文字、文献由那些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礼乐活动的史官来使用保管，他们世袭其职，文字的传承规范而稳定。西周时期的汉字，文字的基础构件已经非常稳定，常用字的传承率越来越高，形声字成为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

至平王东迁，王室衰弱而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各诸侯国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大国、强国陆续出现，争霸、兼并无有间断，旧制度逐渐废除，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与此同时，文化传播的频率加快，使得汉字使用的范围扩大，使用的频率提高，尤其是日常应用中的俗体得到快速的发展。由于没有统一的王权，规范文字的正字政策难以实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俗体在各地域中逐渐沉淀积累下来。至春秋中晚期，首先在南方以楚国为中心，文字具有了明显的地域特色。战国时期，文字的地域特征更加明显，逐步形成了五个地域中心：楚系文字、齐系文字、秦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这五系文字，有着各地域独特的字形和书写风格。

在孔子的时代，“书同文”就已经被看作是文化、制度统一的

必要因素。《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但是，在周室久已衰微，政治、文化都走向分裂的孔子的时代，对于孔子们来说，这实际已是一种对逝去的理想社会的憧憬。《汉书·艺文志》：“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班固所说的“古制”，时间上指的是商周，他所说的“衰世”自然是指春秋战国。

秦一统天下，以秦始皇的雄韬略，他当然明白“书同文”对于他的大一统的重要性，要完成他大一统的梦想，疆域的统一和政治制度的统一是其外在的体现，其核心与保障则是思想文化的统一，“书同文”与“焚书坑儒”是他实现理想过程中一正一反、相辅相成的两件大事，其内涵绝不是时下通常的理解所能包容的。文字的同一是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前提。

关于秦“书同文”的记载，人们最常引用的是《说文解字·序》（以下统称《说文·序》）：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许慎在此指出，“书同文”的原因是因为各国“文字异形”，始皇统一六国后，以秦小篆同天下之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整理规范小篆，作为识字课本和规范用字的标准。原因、时间、主持者、

措施、标准都记载清晰明确。

而《史记》的多处记载，在字词上有所差异，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写一量，同书文字。

《史记·李斯列传》：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始。同文书。

《史记·六国年表》，始皇二十七年：

更命河为德水。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

《史记·李斯列传》二世时，李斯被诬下狱，从狱中上书，陈述自己的罪状：

……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

罪五矣。

《史记》中分别用了“书同文字”“同文书”“同天下书”“平斗斛度量文章”来描述“书同文”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多种理解。误解最早由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起，他在《史记·李斯列传》“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始。同文书”后注“六国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把“同文书”理解为“同六国制令”。据此，有学者指出秦始皇的“书

“同文”是指命令的格式、内容统一，而不是指字体形状的统一。^{〔1〕}

秦统一后，更改了很多名号，如将“王”改为“皇帝”、改“命”为“制”、改“令”为“诏”、天子自称“朕”、改“河”为“德水”、改“民”为“黔首”等，里耶秦简发表后，在“更名方”中人们也发现了这样的“皇帝”名号、职官称谓更名的记载。^{〔2〕}但这样的名号更改，数量毕竟十分有限，不可能成为一项大规模的全国性文化政策。而且，《史记》中的记载，更改名号是皇帝下诏许可的一次大臣的提议，是单独的一次议题，与“书同文”根本不是一个议题。至于命令的制式与内容，其适用的范围只限于部分史官、书佐，何必要兴师动众，在全国范围推广？再者，在法律严苛的秦国，何人敢在命令的内容上不同？况且，如果没有文字的统一，命令的制式与内容也就失去了传播的基础。

还有人提出“书同文”是正用字，而不是正字形。“正用字，即正的是一个词用某个字而不用音同音近的另一字来表示。”“前者主要着眼于字的形体结构，后者主要着眼于字（词）的意义用法；前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同一字形的使用要整齐划一，后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只能使用某个特定的字（词），前者是在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中确立规范，后者是在几个音同音近的不同字（词）中确定一个规范。”^{〔3〕}正用字说，新近还得到了新出里

〔1〕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2〕陈侃理：《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2014年第9期。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3〕张标：《“书同文”正形说质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耶秦简的支持。

正用字说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也得到了新的支持，但我们仍然认为“书同文”是指的正字形。因为正字形是一个前提性的工作，如果没有正字形的基础，正用字根本无从谈起。而且，从秦汉出土资料的对比看，在字形方面，基本做到了统一，而用字方面，基本上没有改变，大量的通假字普遍通行。因此，我们说“书同文”指的是正字形是没有疑义的。

“书同文”是用篆书来统一还是用隶书来统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用小篆来统一；一是篆隶兼行，实际上是隶书统一天下。^{〔1〕}我们认为俗体是因为书写便捷从正体孳生出来的，俗体依附于正体，没有特定的正体，也没有与之对应的俗体。通行什么样的正体，便随之通行对应的俗体，正体、俗体是相辅相成的。从国家的层面看，确立文字的规范，当然是规范正体，国家只能确立一种规范，不可能确立两种规范。因此，从“书同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看，它规范和推广的只能是秦小篆。而秦小篆与秦古隶是相伴而行的，古隶是小篆的影子，如影随形，不离左右。小篆通，古隶行，是一体两面，正如以楷书为规范，行书自然通行一样。

因此，《说文·序》中关于“书同文”的记载仍然是目前最为准确的叙述，《说文解字》（以下统称《说文》）本身也正是以小篆为正体的字书。只不过随着大量简牍资料的出土，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秦汉时期通行的俗体——古隶，使我们对当时文字的使用情况

〔1〕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第2期。

有更全面的了解。

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通过秦文字与楚文字的横向比较，来论述“书同文”政策实施的必要性。通过秦汉文字与楚文字的比较研究“书同文”政策实施的效果，通过秦汉文字与商周文字的比较研究“书同文”政策实施的基础。根据王国维战国文字东土、西土两分法，秦文字为西土的代表，楚文字为东土的代表，二者在战国时期不同地域文字中，特征最为明显，差别最大，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来考察“书同文”政策的实施，不失典型代表的意义。

上 编

从秦、楚文字比较的角度看 “书同文”的必要性

西周时期的汉字，文字的基础构件已经非常稳定，常用字的传承率越来越高，形声字成为新字产生的主要途径，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

西周时期王权统一，文化的权利主要掌握在王公贵族手中，文字、文献由那些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礼乐活动的史官来使用保管，他们世袭其职、父子相传、代代相承，文字的传承脉络清晰、规范而稳定。西周金文，主要是周天子、在朝大臣与各诸侯国的铜器上的铭文，是西周文字的正体，风格严谨肃穆，文字规范统一。

西周金文从早期到晚期，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和平直化，形体越来越成熟与规范。西周文字这种演变的趋势被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正体所继承，形成了先秦时期汉字正体演变的主流。

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权利，天下一统，各诸侯国之间相对平安无事。至平王东迁，王室衰弱，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各诸侯国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大国、强国陆续出现，争霸、兼并无有间断，旧制度逐渐废除，新制度酝酿、推广，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一时代，传统的贵族制度被打破，各阶层之间流动加快，各阶层之间的文化传播频率也随之加快。私学兴起，有教无类，受教育者的数量大大提高，尤其是各国之间的竞争，对人才的重视，使得各类人才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百家争鸣，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最有活力、最富创造性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文化的竞争与繁荣，文化传播频率的加快，使得汉字使用的范围扩大，使用的频率提高，尤其是日常

应用中的俗体得到快速的发展，由于没有统一的王权，规范化的正字政策难以实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俗体在各地域中逐渐沉淀积累下来。至春秋中晚期，首先在南方以楚国为中心，文字开始具有特征明显的地域特色。战国时期，文字的地域特征更加明显，分区域研究已经成为古文字学界的共识，一般划分为楚系文字、齐系文字、秦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五系。这五系文字，分别有着独特的字形和书写风格。其中秦系文字最为保守规范，楚系文字特征最为鲜明突出。

相对于其他各系文字，楚系文字与西周文字以及秦系文字相比，差异化最大，个性特征最为明显，我们将以楚系为主体，以秦、楚文字的比较为核心，排比这些差异现象，分析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从而凸显出“书同文”政策实施的必要性。